

#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 目次

### 〈長篇書評〉

---

誤入歧途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如何崛起？ 黎野平 1

### 〈短篇書評〉

- 
- Alain Badiou Plato's Republic: A Dialogue in Sixteen Chapters 許子文 8
- 張夏準(Ha Joon Chang) 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 23 件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反思 黃可蓁 12
-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 葉明叡 16



#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六年六月 第五十期

資深編輯顧問 徐斯勤、石之瑜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鄭皓中、陳明宗

編輯委員 江俊宜、江俊儒、李天申、陳亮宇、楊尚儒、廖斌州、蘇慶軒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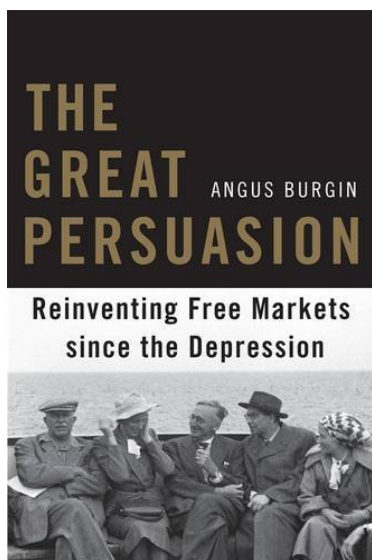
地址：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 3366-8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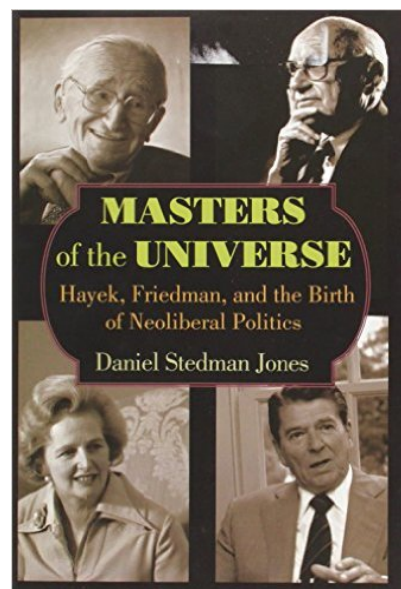
## 誤入歧途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如何崛起？

黎野平 / 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



書名：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作者：Angus Burgin  
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Mass.  
年份：2015  
頁數：320 pages  
ISBN：9780674503762



書名：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作者：Daniel Stedman Jones  
出版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Princeton  
年份：2014  
頁數：440 pages  
ISBN：9780691161013



書名：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作者：Naomi Klein  
出版者：Metropolitan Books /  
Henry Holt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2008  
頁數：720 pages  
ISBN：9780312427993

日前，一向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推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智庫刊物《金融與發展》（Finance & Development）中刊登了一篇名為〈被過度吹捧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Oversold?）文章，文中質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包括財政緊縮、資本自由化、降低國債等，並沒有如預期般達到成效，反而擴大貧富不均，文中並呼籲重新反思新自由主義，檢討對市場機制的盲信。

長期以來，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經常被主流經濟學家與政策制定者，斥為「不懂經濟學」，不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現在，IMF 自己的智庫親口坦承，新自由主義過去三十年來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成長，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得利益，但是，這些都是再清楚不過，有識之士也反覆警告的事實。這篇文章是否代表官方立場的轉變，仍有待觀察，但起碼，它起了一點平反效果。

凱因斯曾經說過，不要低估思想與理念的力量，即使它的影響力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才能完全展現出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並非從一開始就所向披靡，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主張政府應採取干預政策，以維持市場機制運作，並擴大公共支出，積極促成完全就業的凱因斯理念，主導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思維。

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中，凱因斯認為一個讓個人私利無限制鬥爭的市場行將終結，凱因斯固然對馬克思的學說沒有好感，但他相信社會

主義反對「所有人對抗所有人」市場的理念，「每時每刻都在取得勝利」。他相信，政府的干預能在不破壞市場機制的基礎與支柱的前提下，幫助緩解市場機制的失靈。

幫助美國渡過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凱因斯的主張。許多人相信，「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就是資本主義的未來：一個不需要走上革命，又能克服週期性危機的未來。當時，「市場已死」的情緒瀰漫在主流學術圈與政策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奈特曾經在信中說「即便在這個國家，我們也無法再回到自由放任的經濟上」。

但短短五十年的時間，在大蕭條半世紀後的80年代，英美公共領域的學術與政策論辯中，應該讓市場免於干涉，自由運作的想法，又開始再度流行。推廣自由市場的經濟學界拿下諾貝爾獎，公部門的政策開始轉向，而認同理念的智庫更是不斷壯大。

這是如何發生的？本文所評論的三本著作各自從不同面向，討論了這個「典範轉移」的過程。柏根（Angus Burgin）的《大說服：大蕭條之後重振自由市場》（*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以「朝聖山學社」（Mont Pèlerin Society）成員的思想發展為主軸，討論理念與政策說服，是如何以組織性的方式，促成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理念的茁壯；而瓊斯（Daniel Stedman Jones）的《主宰寰宇：海耶克、傅利曼與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誕生》

(*Master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則認為，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勝利的，自由市場的理念重新流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反映的是凱因斯式經濟學在治理上的困境，瓊斯更關心的主題是在個別的具體政策中，包括貨幣、公共住宅與都市計畫等等，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是如何慢慢取得上風的；克萊恩 (Naomi Klein) 的《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則以新自由主義每次取得勝利的政治與社會後果，強調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其實伴隨著毀滅一切的災難，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為的災難。

凱因斯理念在戰後的風行，某種程度上可以歸因於羅斯福「新政」的治理實績，在羅斯福 1944 年的國情咨文中，洋洋列舉各種「社會權利」所組成的政策清單：包括基本生計、住宅、醫療與教育等等，可說是新時代的「權利法案」。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看來可以在國家與凱因斯的調解下，和解並進。

但對自命「正統」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卻是個讓人憂心的走向。李普曼 1937 年寫就的這本《美好社會》，為「自由主義者」的反攻吹響號角。他非常明確地把自由主義的敵人決斷為「集體主義」，這個敵人有很多姿態，有惡質的納粹、法西斯還有共產黨，也有披著良善外衣的漸進改革者：無疑是指各色凱因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歷史上，李普曼這本暢銷的《美好社會》經常被低估影響力，海耶克在接近三十年後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新自由主義奉為主臬的作品——就表明是向李普曼與《美好社會》致敬。批判計畫經濟，把社會主義跟法西斯主義說成同一回事的，堅持任何「有損個人處理經濟事務自由」的社會哲學，最終都會通往極權體制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處處可見李普曼身影。

柏根藉由細緻的爬梳指出，在 30 年代還是非主流的「放任市場」，可以在五十多年後迅猛回歸，絕對不是因為思想本身的力量。海耶克希望他主持的「朝聖山學社」的所有成員，要對根本問題有基本共識，並致力探求實現目標的政策，不要做漫無邊際的思想辯論，朝聖山學社不是學術團體，但也不要是短視近利的類政黨組織，它要更關注自由秩序的普遍原則才行。

儘管朝聖山學社成員的學思歷程與專長各異，但瓊斯對「新自由主義」的界定，不妨可以看作他們的「交疊性共識」，儘管彼時還沒有這個字眼：它指的是「一種建立在個人自由與有限政府理念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理念，因而能夠把人類的自由秩序，與競爭性市場中理性與自利的行為連結起來」。

無論是李普曼或者海耶克，都展現了極高明的組織能力，他們很正確地意識到，思想要取得勝利，就不能

單打獨鬥，要用企業精神經營思想組織，也不妨用營銷話術推廣思想，不折不撓。在往後的日子裡，自由放任的思想起死回生，不只在經濟學界贏得最高榮譽，各種互通聲息的政策研究機構與團體，更在慷慨人士的資助下，逐步奪回論述經濟問題的主導權，李普曼與海耶克當年辛苦播種的因，今天看來成果非凡。

李普曼與海耶克在行動上是進取的，但心態卻是謙卑的。他們都不否認自由主義的實踐出了問題。海耶克對市場的擁護其實來自於他對秩序機緣性本質的觀察，以及對各種「真理」的懷疑，海耶克反映的是「朝聖山學社」第一代在思想上無法掙脫的束縛，他們嘗試克服19世紀自由主義的缺陷，但又從內心深處欣然認同自由主義，「為何自由主義失敗了？為何需要修補自由主義？」是他們懇切探索新的社會秩序基礎時，擺脫不掉的心病。

朝聖山學社的變質，導致日後新自由主義的崛起，是柏根一書另一個重要主題。朝聖山學社無疑起於回應自由主義的危機，但即使是海耶克本人，也無法阻擋朝聖山學社被經濟學家「美國化」，朝聖山學社曾經揭櫫的理想是要打造一個經濟學家與哲學家的對話平台，共做一個有社會哲學基底的「全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但隨著好戰的美國經濟學者逐漸取代謙卑的歐陸學者，經濟學家用市場的真理取代了哲學家看似含糊不清，繼續爭辯十年也不會有輸贏的哲學論辯，海耶克這個宏大的理想顯然無疾而

終。

時代氛圍的轉變，無疑也是「朝聖山學社」美國化的主因。活過大蕭條的朝聖山第一代，目標是謙卑地希望在政府職能擴張之餘，能夠保留市場與個人的自由空間，但對身處冷戰意識形態對抗的第二代人來說，堅信市場價值，擺出絕不向任何「計畫」經濟妥協的姿態，毫無心理障礙。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箇中翹楚，他堅信自由主義絕對不會有問題，自由主義如果出問題，也是因為它失去曾經擁有的涵義，不夠「自由主義」。看待自由主義，他沒有上一代人的心病，他毫不懷疑「能讓美國通往真正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最近捷徑，就是19世紀那條大路」。

對柏根來說，朝聖山學社第二代與第一代截然不同的思想氣質，更強的論戰性格，更堅持市場「真理」地位的立場，孕生了往後我們統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東西。相較於柏根，瓊斯也有類似觀察，但他比較關注的是政策上的理念轉變。他認為早在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80年代之前，部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就已經體現在公共政策上。

瓊斯很精確地把新自由主義界定成「一場政治運動」，它不只是一場反極權政治、反集體主義與反新政的思想潮流，更不是去個人化的全球性「霸權力量」，這也是柏根與瓊斯兩個人研究的獨到之處。

對於朝聖山學社第一代來說，他們所主張的「新的」自由主義，在治理實踐上，並不排斥政府介入的積極作用，面對大蕭條的險峻現實，這些早期的新自由主義者，不得不接受國家除了「守夜人」角色外，確實還需要對市場採取某種形式的干預，並提供諸如社會保險與退休金制度等等社會福利，對於政府作為擴大公民自由重要途徑這點，他們並沒有太大質疑。

但70年代凱因斯主義捉襟見肘的治理問題，像是停滯性通貨膨脹，勞資關係的惡化，失效的社會福利建設，乃至於競爭力的消退等等，為「市場治理」的政策論述提供了進場的契機。加上大西洋兩岸的智庫與研究機構推波助瀾下，像是傅利曼的貨幣主義主張，已經體現英美兩國的經濟政策當中了。

瓊斯認為，以為80年代柴契爾與雷根的勝選是必然的結果，或者以為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突然大獲全勝，都是後見之明。雖說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以後，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他們所主張的政治議程，包括市場的自由化與嚴格遵守財政紀律，都有重大的進展。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更是總結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原則：稅收改革、貿易自由化與私有化、取消管制與強化產權保護。

自由市場理念固然是以雷根與柴契爾的勝利為標誌，但他們的勝利應該視為凱因斯政策思想破產的結局，到了70年代末期，雷根與柴契爾能否勝出還在未定之天，但即便是他們的

對手，也已經慢慢開始相信，凱因斯主義的經濟主張已經失敗了。

瓊斯特別強調，有大量證據顯示，卡特的民主黨政府與後繼的雷根，卡拉漢的工黨政府與下任的柴契爾，其實在政策上有很大的連續性，因此，聲稱在80年代兩國的政策出現革命性轉折的結論，恐怕都太過化約。

但大西洋兩岸的新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無疑已經改變了英美兩國政治決策者，在面對社會與經濟問題時的政策假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念還成功擴展到國際貿易與發展經濟學領域，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結構調整」，成為不可質疑的信念。

朝聖山學社所倡議，日後凝聚在「新自由主義」名下的政策理念，並不是急就章地被拼湊出來，柏根的評論非常犀利，他說：

*他們堅持思想論辯可以轉變政治實踐，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他們進行理論分析，倡導特定思想觀念的方式之所以非常有效，機遇固然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論戰行動背後，是他們集體深思熟慮，彼此反覆切磋的策略，是他們對自己思想的堅定信心，才讓他們得以通過思想，在世界歷史的舞台，重磅登場。*

身為朝聖山學社第二代旗手的傅利曼，對此非常有心得，他認為，思想家的重要性，在於準備好備用方案，一旦發生重要的歷史轉折事件，就能夠讓人們得以選擇，來讓改革「無

可避免」。

但對克萊恩來說，新自由主義者善用機遇的能力，一點都不詩意，也絕對不僅僅是思想與輿論界的事情而已，克萊恩說，傅利曼看待「歷史機運」的態度，其實就是新自由主義席捲世界的策略，這個過去三十多年來，傅利曼與其威權追隨者，所善用的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巨大的危機，然後趁著受驚嚇的人民，還在茫無頭緒時，迅速推進「改革」：拆除一切過去凱因斯的遺緒，把國家資產私有化，重新以市場管制過去一切未被商品化的事物。

傅利曼沒有海耶克的謙卑心態，更沒有海耶克對待自由主義的複雜情緒，自由主義，或者更精確地說，「市場」自由主義，必須要能善用機遇推動，不容任何猶豫與灰色地帶。傅利曼認為，只要推出迅速、突然與大規模的經濟改變，快刀斬亂麻，就能激起人民願意促進調整的心理反應，他把這個策略稱之為「震盪療法」(shock treatment)。

2005年的卡崔娜風災幾乎摧毀了紐奧良，93歲高齡依然筆戰不懈的自由主義老兵傅利曼，反而從災難看出用市場機制重整教育體系，徹底摧毀凱因斯遺緒的契機。全盤激進改造體制的市場改革，往往伴隨鎮壓、驅離與戰爭，這很難說是偶然。

克萊恩據此，將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策略稱之為「震撼主義」(shock doctrine)，利用危機與災難一直都是市

場基本教義派的操作手法，以之來推動全面市場化的聖戰式改革，伊拉克與紐奧良的「重建」並非新的發明，而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震撼主義的極致表現。

70年代阿根廷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為推動市場改革強力鎮壓反對力量，三萬多名以左派為主的反對者「被失蹤」，而傅利曼恰好是皮諾契特座上賓；發生在中國的天安門事件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最後一哩路；柴契爾夫人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後，回頭就對國內抗爭的煤礦工人動手。看來，「市場至上」的「改革」固然能在民主政治下實施，但新自由主義者跟南美、俄羅斯與中國的領導高層可能相處得更融洽。

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從自由中誕生的，放任的自由市場也並不跟民主政治攜手，基本教義派的資本主義，向來都是由最殘暴的壓制形式所接生，它往往以戰爭、酷刑與經濟的三重震盪而伴生。對克萊恩來說，這才是新自由主義崛起的政治脈絡。

而它的後果，也遠遠不是更好的發展，更自由的社會，而是伴隨新自由主義崛起，壟斷資源的新政商集團。過去三十年每個採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出現由少數大企業，與富豪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政治聯盟：俄羅斯的寡頭集團、中國的太子黨、智利的食人魚、布希錢尼鼓吹的先驅等等。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後，非但沒有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與分配原本



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俄羅斯的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伊拉克的重建工程合約。

在這場對「福利國」與「大政府」所戰爭中，目標不再是征服新的領土，或者創造更人性化的社會（儘管他們確實如此深信），而是徵收變賣這幾十年間政府與勞工協力積極建設的公共工程，這一次，國家本身就是新的領土，而要徵收與變賣的，是國家的公共服務與資產：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削減社會支出

曾經，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不分出身與門派，共同挺身對抗的是，以真理之名戕害人性的「科學社會主義」，不過，新自由主義所體現的，正好是以市場為真理，以經濟學傍身的「科學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市場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它的前輩所批判的危險意識形態：渴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民粹。

柏根、瓊斯與克萊恩這三本書的共同主題是，堅持市場真理的，擁有「純粹與清楚的邏輯完整，結合激進主義的理想主義」，號召力不下於馬克思主義，許諾創造「企業家烏托邦」的「新自由主義」，是如何降生於大地的？回顧這個思想型塑與政治運動的過程，不妨說是自由主義誤入歧途的故事。

如果朝聖山學社第一代創建者，希望結合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一起構作全新的自由主義理論，並維持體現機緣性自由的市場，不受國家侵

犯，以此重建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那麼，當代至關重要的思想任務，或許是重拾朝聖山學社第一代的志向，而這次，不該再對市場屈服。

## Plato's Republic: A Dialogue in Sixteen Chapters

Alain Badiou

許子文 /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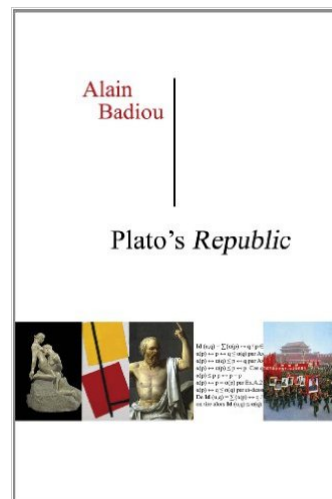
在這本把巴迪歐 (Alain Badiou) 自己稱之為「超譯」柏拉圖《理想國》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柏拉圖對於政治與正義的古典對話，穿越時空在 21 世紀的街頭重現蘇格拉底與詭辯派的論辯。

巴迪歐並不是單純用自己的哲學語言「詮釋」柏拉圖，他的野心比這更大，他要挑戰的是當代把柏拉圖當成極權體制哲學家的通見，也要讓當代的讀者能以全新的方式，理解柏拉圖的「真理」、理想的政府形式、以及今天的我們必須如何參與政治。

巴迪歐用自己的哲學詞彙「超譯」理想國，例如他把柏拉圖的「靈魂」都代換成「主體」，然後「神」變成了「大他者」(the big Other)，並不是沒有引起批評。但這著實問題不大，畢竟，「翻譯」有時本來就是為了保留原來文本，而是為了讓文本，可以重新與當代的我們對話。

Amanda 這個女性角色在柏拉圖的原文中並不存在，「她」是巴迪歐對 Adeimantus 的變體，她對政治懷抱熱情，在柏拉圖原文中耽溺於詩學的她，穿越到當代不妨稱之為「文藝少女」，她憂慮蘇格拉底對「正義」與的嚴肅追問，所以一再歇斯底里地追問蘇格拉底「哲學」的意義，追求一個輕靈不失愉悅理論的她，其實正是校園裡質疑一切「大敘事」的後現代理論學徒。

Glaucon 這個年輕人也對政治懷抱熱情，但不同於 Amanda，他懷疑「理論」的作用，但內心又渴望一個能夠讓他真誠投身政治的論述，來到當代他可



書名：Plato's Republic: A Dialogue in Sixteen Chapters  
 作者：Alain Badiou  
 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Mass.

年份：2012

頁數：400 pages

ISBN：9780231160162

能會是街頭血氣方剛無畏行動的年輕人。Thrasymachus 所描繪的是一種僭政的最高成就：不義之人用一種對正義陽奉陰違的態度獲得世間的名望以及實質的成功，Glaucon 與 Amenda 並非對此毫無知悉。

這兩個人一個遺憾沒有一個真正能令人決意投身的正義理念，另一個則害怕實踐正義所帶來的沈重。他們顯然是巴迪歐筆下最有潛力成為政治家的年輕人，但他們還需要「哲學」，Amenda 必須不再把哲學看作政治的敵人，而 Glaucon 則必須不再被僭政所誘惑，巴迪歐要向他們展示的是另一個崇高的夢想以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共產主義。

柏拉圖在現代哲學中的聲名其實不怎麼好，巴迪歐認為，當代反柏拉圖的哲學立場，一支是尼采、伯格森與德勒茲的生機論哲學。在他們看來，柏拉圖是反對生命哲學與生成流變的始祖，尼采說，我們必須「治療重病的柏拉圖」，並且擺脫柏拉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對柏拉圖也甚無好感，前者反對柏拉圖對感官與理智的二分，後者相信「存在先於本質」。

而讓巴迪歐認為最需要反對的反柏拉圖立場，可能是像卡爾波普 (Karl Popper) 那樣，把柏拉圖當成「開放社會」的敵人，開放社會是一個歧異的意見與利益可以共存的民主社會，開放社會不能由任何聲稱是「真理」的東西來組織，因為真理最終都只會

造成極權體制。

但值得一提的是，巴迪歐把柏拉圖沒有命名的「第五種政體形式」說成「共產主義」，巴迪歐這個選擇並不單單出自於意識形態，也與我們當前的政治情境，以及巴迪歐的整個哲學與政治，堅持用數學重建哲學，與毛派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息息相關，巴迪歐選擇了一個在當代哲學中頗政治不正確的形象，可能也就毫不意外。

在巴迪歐看來，當前的民主政治，其實與柏拉圖寫作《理想國》時的雅典城邦並無二致，柏拉圖的民主政體被巴迪歐稱作是無法創造真理的「輿論民主」(democracy of opinions)，當代的詭辯派就是公關專家、智庫裡的假知識分子，這樣的民主遠遠不應該是「歷史的終結」，相隔千年的柏拉圖與巴迪歐可能有一個共同的關懷：必須超克這樣的民主，創造新的理想國。

可以沿著一個「民主」的光譜來看待柏拉圖的四個政體，及其當代的對應：第一種政體是「財閥政體」(timocracy)：由帝國主義創造的軍權政體；第二個政體是「寡頭政體」(oligarchy)：這是資本家宰制的政體；第三則是僭政：也就是法西斯主義；最後一種政體則是民主，由人民組成的議會治理的政體。

民主政體之所以容易出差池，導致變成寡頭與僭政的原因，是因為它依然為個人私益所宰制。但，柏拉圖

筆下沒有命名，比民主政體更為關注平等的「第五政體」，就不會有墮落成「財閥政體」的危險嗎？像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政權，最後全都變成了極權政體那樣？巴迪歐看來，這是當代共產主義的難題：必須超越已經「飽和」的黨-國形式，來重新構思共產主義。

對巴迪歐來說，唯一一種能夠創造正義的政體就是共產主義，而讓共產主義得為可能的並不是像是民主政體那樣，靠判斷與意見，整本書中，我們反覆看到民主如何墮落成寡頭，退化成享樂，因為這樣一種政體，無法妥切地控制欲望與情緒，巴迪歐認為柏拉圖非常清楚當代民主的軟肋。

但共產主義這種政體形式並不是一種聚焦於經濟與法治的政治，而是一種與之保持距離的政治。共產主義讓不受權力誘惑的哲學家擁有權力，但所有的公民也都要是某種意義上的哲學家，參與政治的能力必須要跟哲學的教養互相搭配。

新時代的理想國，圍繞著勞動者、運動者與軍人三位一體而建立，而這三者是彼此可互換的，他們是共產主義理念的衛士，巴迪歐用這些衛士代換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但為了落實這樣的理念，資本必須要從這個社會中消失，就像柏拉圖要讓私產制消失一樣，這樣主體（公民）才能分受真理之光，從柏拉圖的靈魂三分說脫胎出來主體的三重媒介：情緒、欲望與思想，最終必須要由思想取得主宰。

許多的對話都著眼於，在這個假設的理想國中，主體（公民）要怎樣做才好？巴迪歐筆下的蘇格拉底，熱情澎湃地宣稱，為了要掌握真理，公民必須要熟習集合理論與幾何學，這兩門學科要變成年輕人的必修。在當代社會的新洞穴中，巴迪歐說這其實是個巨大的電影院，一旦有一個人離開了電影院，他就進入了思想的真實世界。但離開洞穴電影院，來到真實思想世界的主體，要怎樣維持對理念的忠誠（fidelity）呢？而這顯然是巴迪歐自己的哲學問題：一個主體要如何忠誠於事件呢？

正義是客觀性的，它必須由許諾共產主義的公民建構，成為社會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主觀性的，它必須能夠控制一個人的欲望。欲望是主體三重媒介中最為難解的部分，因為它是能夠結合思想與情緒的真正力量，一旦三者真正連結在一起，像柏拉圖說的那樣處於和諧狀態，主體就成為能夠創造正義的「太一」（On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迪歐「筆下」的蘇格拉底是個勇悍的狠角色，那位知名的詭辯派 Thrasymachus 被弄得像是一個專擅修辭的邪惡形象，修辭與哲學之所以水火不容，正在於修辭跟輿論緊緊相依，但輿論能載舟亦能覆舟。蘇格拉底要徹底擊潰詭辯派，哲學要成為贏家，而非修辭。

而也許巴迪歐對柏拉圖的真正「超譯」創作是「真理」這個理念，巴迪歐說柏拉圖把真理當作一個生產

性過程，不是一個「說了什麼」的立場，而是一個某種巴迪歐稱之為「超驗情境」的原初性原則。

主體要通過思想，通過哲學切近真理，不過，真理對於各種不是真理的輿論與其他，卻完全冷漠，這種冷漠態度既是卡爾波普說柏拉圖是極權主義者的立論，也是巴迪歐能把蘇格拉底改寫成狠角色的理據。真理位居有階層的秩序，而它本身具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對巴迪歐而言，真理其實遠在天邊，就在離開洞穴電影院後的世界裡，但主體必須要反覆努力，嚴加規訓，才能讓真理實現。在巴迪歐的超譯中，我們反覆感覺巴迪歐對於真理的熱忱，讓我們意識到政治必須再次跟勇氣與正義接上線，如此，一種真正的平等，那姑且名為「共產主義」的第五種政體，才有實現的可能，而這可能是柏拉圖真正的政治教誨，不妨以巴迪歐這段「超譯」作結：

*我們當然期待某些政治在有朝一日能成為支撐理念的現實，不過，即便現在尚未出現這樣的政治，但我們的任何作為，都要嘗試忠誠於這個理念。*

## 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 23 件事：自由市場的

### 資本主義反思

張夏準 (Ha Joon 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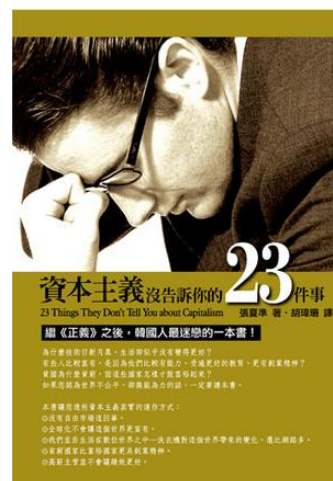
黃可羨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

#### 壹、內容摘要

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 (Ha Joon Chang) 在《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 23 件事》著作，延續《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的精神，一一針對自由經濟基本假設與理論，引經據典提出反駁。全書並無艱澀的經濟學理論或術語，論述詳實且淺顯易懂。本書目的是協助讀者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情形，並提出原則性方向供讀者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全然否定資本主義的存在，而是認為在自由市場施行的資本主義並非如此完美無瑕。

首先，作者提出自由市場並不存在的論點。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曾提出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會自動發揮調節力量，達到市場最適效率。背後卻忽略市場存在的本身即是由政府的規則建構而成。由於我們習慣無異議接受整套經濟規則，便以為無任何規則存在。當自由市場主義者提倡貿易自由化，欲透過「消除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達到此一目標，便是干預市場本身。

常理上，我們簡化變數以便操作經濟的研究，其中基礎假設：人為自利且具理性的個體，在有限資源追求最大的效用。然而作者認為此種理性假設與事實並不相符。理由之一是行為者並非有足夠能力應付複雜的市場，規則的存在限制了系統出錯的機率。理由之二當我們犯罪的付出成本高於遵法的成本，選擇遵守規範係出於自利的表現。因此邏輯上，我們並不會基於大眾利益，浪費時間或金錢去



書名：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 23 件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反思

作者：張夏準 (Ha Joon Chang)

譯者：胡瑋珊

出版者：五南

出版地：台北市

年份：2014

頁數：376 頁

ISBN：9789571177038

獎懲他人的行為。但事實上卻不完全是如此。我們會無償點閱拜訪過的店家好評或讚美他人的良好行為，遵守具有道德意涵的無形獎懲制度（頁63）。

其次，經濟是政治的結果。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人民抗議英國禁止工廠雇用九歲以下孩童的法規，違反自由市場的精神，迄今我們基於人道精神，拒絕雇用童工發展經濟。規則隨著時代轉變，而「貿易自由化提倡人民福祉」的論點，也許也會因政治觀點的轉移影響了規則轉換（頁12）。

此外，政治也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市場的薪資水準。當瑞典人與印度人從事相同的工作（書中以計程車司機為例），前者獲得的薪資是後者的五十倍，不表示瑞典人開車數量或人力資本多於印度人的五十倍<sup>i</sup>。因為在時間的限制下，富國勞工的一天勞動量或品質多於窮國勞工的機率極低。故造成兩國薪資懸殊的原因是富國對移民規範進行高度管制，進而造成本國生產力難以被廉價的勞工所取代。因此，富國的整體勞動薪資水平應多於窮國的整體勞動薪資水平五十倍。那麼，造成窮國貧窮的原因除了移民規定較寬鬆外，是窮人拖垮了薪資嗎？

作者認為以算術平均來看，窮國窮人的確拖垮了整體薪資平均，但忽略重要變數是在窮國進行與富國窮人相同工作的窮人，面臨了外來性競爭。故在外來競爭的前提下，窮國窮

人相較於富國的窮人而言具有相同的生產力。反而是窮國的富人們相較於富國的富人們擁有較低的生產力，致使整體國內薪資水準無法大幅提高。

那麼直觀來看，造成富國富人相對優勢的原因是良好的教育水準或較高的生產力嗎？作者轉而告訴讀者是「制度」創造了優勢。因為當富裕國家追求機械化和去工業化的過程，勞動力反投注於低技術性的工作，良好的教育不見得可以提升低技術性工作的生產力，「去技能化」的現象意味著經濟成長的國家不需要教育程度高的人民。同時，普遍推崇教育反造成教育的通貨膨脹現象，也間接表達學歷的獲得不代表是專業能力的養成，而是代表你比其他沒有這個學歷的人更努力的特質。但個人的良好的教育能得到發揮功效，卻是基於富國的經濟體系，基於政府完善的組織與基礎建設等集體行為（頁240）。

顯然，我們可以從前面的論點得知：作者肯定了大政府的表現。第一、在缺乏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下，勞工為了基本生存需要，可能選擇穩定高薪的工作，造成人才錯置的狀況。反之，北歐國家制定了完善的福利政策，確保勞工有二次就業的機會，勞工無後顧之憂選擇自己適任的工作（頁282）。第二、作者洗刷政府只會產出「失敗的產業政策」的刻板印象。以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南韓樂金公司（LG Group）、現代集團（Hyundai Group）被迫改變原本決策，投入電纜與造船產業，反奠定集團的現代發展基礎（第164頁）為例，可看出足夠且

<sup>i</sup> 人力資本表示經由培訓或教育所累積的知識與技能。

延續的政治意志有助於提升政府產業政策的「打擊率」(batting average) (頁171)<sup>ii</sup>。

最後，根據羅斯托經濟成長理論<sup>iii</sup>，國家經濟成長分為六階段，現今富國產業欲走入第五大眾消費與第六超越大眾消費階段，由製造業轉向知識導向的服務經濟，提升生活品質。追求知識性的服務產業，讓本國製造業出走或外包服務業務到第三世界國家，所帶來的產業空洞化現象並不如想像中令人擔憂。

因為，作者認為產業空洞化是工業部門與服務部門的相對動態比較(頁123)，早期製造業產品的可貿易性較高，帶來本國的出口能力上升，相對擁有較高的能力可自國外進口先進的技術，帶來經濟快速成長。然而服務業的可貿易性較低的特質，不免會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由生長力較緩慢的服務業主導國家經濟發展，勢必面臨國家經濟受到國際競爭力削弱與國際收支逆差的衝擊。作者舉出就連以逃稅天堂聞名的瑞士在早期也是以強大的製造業作為後盾之下，開啟服務業。不應該本末倒置一味追求去工業化發展。

## 貳、評論

<sup>ii</sup> 打擊率係指棒球運動中，評量打擊者的成績依據，計算方式為安打數除以打數。

<sup>iii</sup>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於1960年發表的經濟成長的階段論，起初只有五階段，1971年加入第六階段。分別有：傳統社會、起飛前的過渡階段、起飛階段、邁向成熟的階段、大眾消費與超越大眾消費階段。

綜觀全書，作者張夏準打破自由市場傳遞的主流價值，以最通俗、簡白的文字揭開自由市場主義倡者所隱蔽的真相。過去所推崇的資本主義是否為最理想的經濟體系？答案是肯定的。追求利潤一直為我們發展經濟成長的動力，透過政府的舉債、寬鬆政策解決過去各種金融海嘯、歐債危機，雖符合自由市場理論的操作原則，但事實也告訴我們，隨著貧富差距和缺乏就業保障的現象日益嚴重，自由市場理論需要重新被評估。以本書角度出發，若過去市場經濟學的假設值得質疑，那麼再用過去的思維處理現今複雜的經濟系統，系統設定的出錯機率極高。

以邏輯分析角度、作者著述方式與論點說服力方面來看待此書，作者善於使用豐富例證闡述論點，以兩國佐以數據比較分析。每一章節透過正(他們告訴你的事)、反(它們沒有告訴你的事)、合的方式引導讀者進入自由經濟理論的「真相」。更甚於當一論點說服力不夠強健時，作者會以反面推導法告訴你：即便不能因成功案例就斷定政府都能有成功政策；反之，也不能因有失敗案例存在，而全盤否定政府想要產出成功政策的努力(頁171)。

那麼也定有人提出問題是政府產出成功政策的機率很低的質疑。作者也會坦然承認：對，沒錯，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並進而解答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提出新的論點，使讀者心服口服。



最重要的是，身為當代發展經濟專家的張夏準與其他經濟學者不同之處在於根本性質疑自由經濟市場的本質，致力於傳達：若太過於信任此套市場規則，可能摧毀開發中國家，摧毀我們的世界。然也不必太過於悲觀真相被揭露，在其著作裡面並沒有受制於結構，而無法改變制度。而是相信人性有其良善之一面，透過政治意志改善制度、組織，我們能讓弱勢國家得到公平，讓經濟制度更加完善。

## 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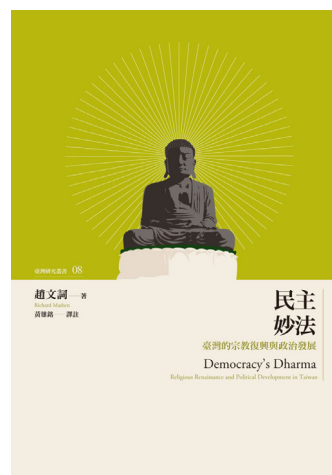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葉明歡 / Emory University 健康政策博士生

### 壹、前言

宗教與公共生活的關係是什麼？在啟蒙以及現代世俗化的國家 (secular state) 建立之後，宗教雖然被歸到相對於公領域的私領域，只和個人的家庭生活、個人信念、價值有關，但社會科學研究者已經提出許多理論說明，在特定的宗教背景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得以鞏固，資本主義市場得以發展 (Tocqueville, 1835; Weber, 1905)，而公、私領域的劃分，也被批評為僅為基督教世界觀對於宗教的界定 (Asad, 2003)。東方的脈絡又是如何呢？普遍而言，人們認為在亞洲以儒家主義 (Confucianism) 為基底的「亞洲價值」與西方、現代化的自由民主秩序並不相容 (頁 41)，要使亞洲國家現代化，勢必引入某種西方價值不可，而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亞洲各國從十九、二十世紀至今，確實也引入了無數的西方價值和制度，從最抽象的憲法、韋伯式行政官僚、國家統計、司法審判到非常實質的福利政策等皆然。就制度外觀而言，若干亞洲國家已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沒有太大區別。

在這本書中，作者趙文詞嘗試使用台灣的四個宗教團體—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行天宮—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為案例，反駁西方價值對民主必須論。他想要說服讀者，在亞洲的台灣儒家文化社會，已然發展出某種特殊的宗教模式和價值，一方面可以作為鞏固民主制度的要素 (縱使不到鞏固這麼強烈，也至少可以減少民主生活中的衝突)，另一方面又有別於西方價值，走出一條更朝向普世 (但同時又鞏固台灣民族認同)、消弭文明衝突的可能道路。



書名：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  
作者：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譯註：黃雄銘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地：台北市

年份：2016

頁數：336 頁

ISBN：9789863501169

## 貳、核心論述

簡言之，趙文詞認為，台灣的宗教不論其為儒、釋、道或三者混合的背景（從趙對於四個宗教團體的分析中，顯示出他認為四者皆有儒家的基底，有趣的是，在本書中他似乎沒有明確說出，究竟儒家是不是個宗教），皆蘊含有某種將原本儒家社會中的私人之間的關係，延展至不同社會部門的功能。宗教組織的參與者透過信仰與實踐，先是從反求諸己的自我修練，延展到屬於同一宗教組織的其他成員，再延展到其組織服務的社會成員，如此延展的夥伴關係介入了公共事務、擴大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共同分擔的責任感」（頁 57），正是這種責任感促成了有利於民主制度的社會實踐、培養了民主制度必要的公民美德、減少了民主化過程的衝突與紛擾。其次，四大宗教團體為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倫理基礎，某種可類比於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促成了中產階級的興起與公民社會的蓬勃。第三，四大宗教團體在國際之間的信仰實踐，也使得台灣人在政府無力回應期待、備受打壓的國際空間中，尋覓得民族認同的歸依之所，強化了台灣的認同意識。

## 參、章節安排及內容

要推導出以上結論，以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標準而言毋寧是艱困的，價值體系是眾多社會科學概念之中極難量化亦甚少資料可資運用的領域，更遑論是建立因果推論的方程式。與之相對，作者運用某種傳統的人文途

徑，融合參與觀察法、關鍵人訪談以及文獻探討，試圖以個人融會貫通的洞察力和眾多的精采故事來提高說服力。在第一章，作者簡要交代了這些方法，接著作者歸納研究的四個宗教組織的共同特性，包括在物質特性上，他們皆有廣大的在家居士組織，並擁有大量財產、嫻熟於媒體運用；在信仰層次上，他們皆某種程度將傳統信仰「去神化」；「儀式的貶值」（devaluation of ritual）；以及「組織的理性化」（頁 58-61）。本章最後說明台灣宗教組織發展的政治背景脈絡，從二戰後的戒嚴時期宗教組織與威權統治者的關係，到八十年代解嚴，並特別提及兩岸緊張關係下民主化進展的困境。

第二至五章分別為四個宗教團體的深度個案研討。在結構上多從該團體領袖人物或是建築環境的某個特定場景開始描述，接著綜論該團體的組織、運作方式，與民主生活的特殊相關性，再從團體創辦人的生平和發跡過程回顧這些相關性的起源為何，最後回到該宗教的核心價值與精神與民主生活、公民美德或民族認同的探討。在最後的結論章節，作者試圖將台灣研究取得的經驗一般化，指出以台灣為典型的儒家社會的「公民宗教」發展模式，即強調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合作、而非競爭和衝突，儘管與傳統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和公民社會理論不甚相合，卻也獲致相當的成果。由此發展出的「合一的民族主義」（ecumenical nationalism），一方面承載了台灣新興的民族意識和「特殊社區認同的基底」（頁 273），另一方面也透

過宗教實踐中不斷地重新詮釋而更為開放、寬容，台灣的宗教組織引導信眾從小而特殊的關懷逐步擴散至廣而普世的大愛（頁 251-55）。作者似乎認為這點是融合亞洲價值、模糊公／私界線的台灣宗教與西方那種單一、排他性宗教的最大區別，也是有能夠緩解衝突之處。

時至今日「文明衝突」似乎一語成讖，那些鞏固西方民主制度的宗教元素在全球化的族群揉合處境之下，反倒成了不寬容和壓迫的起源；追求無止盡增長的巨大資本，則日漸吞噬了一切道德的社會（包含宗教）基礎，作者認為，到頭來，人類社會還是必須回答：「為了公平正義、人類連帶與永續生態和諧之故，應當對財富權力的追求安上何種道德限制？」（頁 265）的問題。台灣「進步性宗教」（頁 273-75）的經驗，或可做為西方社會現代性危機中正義與忠誠的道德基礎，以維繫自由民主世界的秩序。

#### 肆、評論

首先是方法上的問題。作者在本書中說了許多動人故事，然而讀者不免會感到質疑，作者對於這四大宗教團體的觀察是否過於片面，許多基本陳述與現今台灣社會對這些團體的普遍認識有明顯出入。例如，作者提到「儘管證嚴確有其別具克里斯馬的權威，且慈濟人也不斷引述著他的話語，但他們並不展示她的照片，或從事其他諸如個人敬拜（cult）等方面的情事」（頁 76），但從公共媒體揭露可得知，證嚴的地位在慈濟內部已逐

漸神格化，可參考李瓊薰報導的一個鮮活案例（2011）。其次，縱使我們不要求統計顯著上的因果檢證，作者在探討各團體時，做出的推論時常較近似於作者個人對於該團體理念的想望，而欠缺推論的證據。例如，在中作者認為「慈濟對於台灣民主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它產生了西方理論家口中的公民美德，亦即『心靈的習性』，即為公共利益而體現出的一種有紀律的責任感」（頁 120）。這是貫串本書核心概念的重要論證，然而觀諸上下文，實難以推出此宣稱。另外，或許受限於受訪者以及宗教團體、領袖產生論述本身的模糊性，本書中常有用詞意義模糊之處。例如第三章中探討人間佛教傳統、星雲大師所說的「自依止」（self-reliance），作者從自力更生，將其擴大詮釋為能夠抵抗權威的自我尊重，進而推導出平等的概念（頁 164-67），然而此處的自我尊重，與民主社會必要的自我意識和平等又有何關聯？甚為模糊。

最後是一點理論的回應。作者在本書中多次提及「合一的民族主義」，他宣稱，宗教團體提供了集體想像作為台灣新興國族認同的基礎（其中有某種亞洲價值，以及台灣被國際社會排擠而以宗教實踐作為突破點的經驗），並進一步將台灣與世界連結，散播愛心與尊重文化（頁 98 註 61、頁 251-55），但在缺少資料支持下，這終究是宣稱多於實際。另一方面，若「合一的民族主義」能夠走出認同衝突與壓迫的困境，將會是民族主義理論的突破，因為這正是民族主義不斷受到自由主義及普世主義者質疑之處。但

儘管作者暗示「合一的民族主義」能夠超越單一信仰下「帝國主義式的普世主義」(imperialistic universalism) (頁 271)，他幾乎沒有與當前民族主義理論在這方面的嘗試進行對話，例如自由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 或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吳叡人，1994；Miller, 1995；Tamir, 1993)。這些理論已建構出在多文化、多民族的現況下避免壓迫、求同存異的規範架構，與之相較，「合一的民族主義」反而會另人擔心是否徹底內化了某種道德權威，一方面聲稱所有至高的慈善／悲、愛、與道德義務都是廣裘無邊的，另一方面，它們的內容和邊界又是由宗教組織內的權威者所詮釋界定，在這種狀況下，「合一的民族主義」如何緩解衝突、鞏固民主生活，而非在表面上包容一切，實質上任憑恣意的既存權力施展呢？

總結而言，本書對於台灣四大宗教團體有一定深度的介紹，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生來說，或可做為思考在台灣脈絡下宗教與公共生活的起點；對於那些不信任西方自由民主秩序、或對儒家文化依舊懷抱希望的讀者來說，本書描繪了可能的理論進展方向—尚待更多經驗的檢證。

#### 參考文獻

李瓊薰，2011，〈有災時 要先搶救師公上人〉，《美國慈濟世界》，193。  
 吳叡人，1994，〈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與傳承》，台北市：彭明

敏文教基金會，頁 57-86。

Asad, T. 2003.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amir, Y.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cqueville, A. 1835. *Democracy in America*.

Weber, M. 190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政治科學季評長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截稿日期：長期徵稿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二)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三)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四)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mailto:PoliSciRevie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